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 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 分层(1978—1996)^{*}

吴晓刚

提要：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是如何变化的，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业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的优势/劣势的变化时，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关键词：自雇佣 劳动力市场 社会分层 市场转型

私有部门在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出现和随后的壮大是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onnell & Gold, 2002)。东欧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中国自70年代晚期起，市场机制就逐渐被引入到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之中，以促进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例如，在匈牙利和波兰，农民和工人早就被允许参加一些农副业和私有工商业活动，以赚取额外的家庭收入(Szelényi, 1988)；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从事非农产业的私人经营活动(Qian, 2000)。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与私营企业也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非常活跃(Gold, 1991)。私有部门的兴起给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再分配制度不断地被侵蚀。

^{*} 本文的原稿为英文，感谢郭茂灿为本文翻译所做的一些工作。

私有部门的出现和发展在影响改革中的社会分层秩序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转型经济中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私有自雇活动的利润(World Bank, 2000: 152—154)。以往对后社会主义时期自雇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自雇活动的模式，即谁会成为自雇业者；二是从事自雇活动的后果，即自雇业者与其他群体相比在社会分层的结果上(如收入)会怎样？在宏观层次的制度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模式的变化之间(这是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比较社会学家近年来最感兴趣的题目)，劳动力向市场部门的转移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连接桥梁。

尽管对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自雇活动的研究在关于市场转型的文献中占有相当多的篇幅(Gerber, 2002; Hanley, 2000; Szelényi, 1988; Róna-Tas, 1994)，而有关中国在这方面情况的研究则相当少。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变动(如 Bian & Logan, 1996; Nee, 1996; Xie & Hamum, 1996; Zhou, 2000)。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劳动力自身的市场转型与收入不平等的联系的分析，鲜有人关注。然而，这一问题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变动中又值得特别关注，因为中国成功的体制转型道路正是以私有部门的渐进而持续不断的扩展为特征的。

在本文中，我提出一个机会—流动论的视角来阐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应对随着市场部门的扩张而带来的机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市场部门工作的人的组成变化是如何影响后社会主义的分层秩序。通过对1996年“当代中国的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调查数据分析(Treiman & Walder, 1996)，首先检验进入自雇业模式在中国城市和中国农村的背景下有怎样的不同，然后通过揭示这些进入模式上的差异来帮助理解中国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收入不平等模式。

一、转型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分层

本文所说的“自雇活动”(self-employment)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与拿工资受雇于人相对，包括在非农业部门为自己工作的所有工作。正如斯坦美兹和莱特(Steinmetz & Wright, 1989: 979)所说，“自雇业者是指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或全部的收入，而非出卖自己的劳动给雇主以获取工资的人”。从概念上讲，“自雇业者”并

不等同于“私营企业主”，但是他们代表了一个很容易辨识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趋近于私营企业主在经营企业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Aldrich & Waldinger, 1990; Gerber, 2001)。一个自雇者既可以雇佣工人，也可以不雇。在中国，自雇业者通常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

前社会主义国家私有部门中自雇业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即在资源分配机制上的变化和在机会结构上的变化。首先，由于市场和再分配代表了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在再分配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了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直接生产者在经济报酬的分配方面比再分配者更占优势。其次，市场部门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机会。比如，经营私营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沿着官僚等级发展之外的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Nee, 1989a: 667)。

这两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通过两个在概念上不同的过程对社会分层发生影响的。第一个过程是直接的因果效应：制度变迁直接导致了各个社会位置得到回报的规则发生了变化。第二个过程则体现出新的分层秩序可能来源于机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随后向不同社会位置的流动。以前从制度主义视角做出的有关市场转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关注前一个过程。近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强调后一个过程对后社会主义时期不同分层结果所起的作用。

(一)制度主义视角：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再思考和超越

市场转型文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党干部相对于新的私营企业主在经济优势方面的变化(Szelényi & Kostello, 1996; 边燕杰主编, 2002)。由于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所偏好的有所不同(Szelényi, 1978)，一些学者预测，在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将产生一个更有利于直接生产者/私营企业主而非再分配者的权力转移过程(Nee, 1989a)。一些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一命题，它们报告说对政治权力的回报下降了，而对人力资本和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回报有所上升。然而，另外一些学者用相反的经验结果质疑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解释，以强调政治权力的继续(power persistence)(Bian & Logan, 1996)、政治权力向经济优势的转换(power conversion)(Rona-Tas, 1994)，以及政治和市场的同步演化论(co-evolution of politics and markets)(Zhou, 2000)。

尽管有上述不一致,但是参与到这场争论中的学者看起来都相信,他们可以基于所观察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来对社会分层制度机制的变化做出直接的推论。比如,干部/党员的优势往往可以归结为再分配机制的作用,而对人力资本和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回报的上升则可以归结为市场机制的结果。然而,根据观察到的不平等的模式对背后的因果机制做出推论是一个逻辑上的跳跃,这样做必须依赖于许多过度简单和未经检验的假设。因此,如果不全面理解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过程,关于市场转型结果的理论争辩将没有结果(Zhou, 2000)。

基于此,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超越市场转型争论的框架,试图解释在各种具体的制度背景下发现的不同经验结果。对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本的回报的变化可能被一系列中间变量所解释,比如工作单位(Wu, 2002; Zhou, 2000)、当地政府—市场关系(Parish & Michelson, 1996)或者替代性的收入来源(Walder, 2002),而不是因为市场制度的内在特征。因此,“谁赢谁输”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要视市场和之间不同的制度安排而定。

在将制度背景具体化之后,以前被引用来支持不同理论命题的经验发现就不再相互矛盾了。泽林尼和科斯泰罗(Szelényi & Kostello, 1996)曾经指出,快速扩展的市场部门产生了很多新的机会,而能够利用这些新的机会的人将成为赢家。但是,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是不同的。改革早期,当进入市场的风险极高、又不需要很多技术时,大部分的自雇业者来源于社会的底层。而当私营经济变得更具合法性,同时市场竞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时,那些具有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人开始加入到市场活动中去。一些干部就是在这一阶段成功地将他们的政治特权转换为新的经济优势的。另一方面,如魏昂德(Walder, 2003)所认为的那样,市场改革不仅在私有部门中产生了经济机会,它也为公共财产注入了新的价值,从而给那些在公共部门里的干部精英带来了机会。不过,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干部精英可以侵占国有财产,要视制度变迁和法律保障的程度而定;而这两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改革阶段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以上研究表明,从再分配到市场这一宏观的制度变迁对后社会主义时代干部优势的变化并没有直接的因果作用。相反,这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些中间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机会结构的变化开

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可以说,正是变化了的机会结构将宏观的制度变迁和个人间分层结果方面的差异联接起来。

(二)机会—流动视角

虽然学者们在有关后社会主义分层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了机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机会结构在过去的研究中仍然只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它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研究。倪志伟(Nee, 1989a)曾正确地指出,市场经济的出现将改变机会结构,并将使得经营私营企业成为另外一条(向上)社会流动的道路。然而,他对中国农村收入获得的经验分析仅仅用“从被抽样的村庄到城市和到市场的空间距离”来测量市场机会的作用,而没有直接比较再分配和市场两种制度之间的机会结构。

在倪志伟所指出的那种二元机会结构下,“人们可以沿着官僚等级往上爬,也可以尝试通过市场往上爬”(Szelényi, 1988: 65)。但问题是,是哪些人留在了官僚等级之中,又是哪些人转向了市场部门?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后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秩序的变迁极其重要。早期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和匈牙利,参与到自雇活动中的主要群体来自于社会等级中的底层(Nee, 1989a; Szelényi, 1988),他们从市场中获得的利益将削弱共产党干部的相对优势(Cao & Nee, 2000; Nee, 1989a, 1996)。但是,干部并不总是停留在体制内的官僚等级之中。在共产主义体制解体之后,匈牙利的干部精英比普通劳动者更可能将自己转化为公司企业家,并维持他们的经济优势(Rona-Tas, 1994)。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前共产党员继续享有收入优势——而这些优势很难归结于已经解体了的社会主义制度(Gerber, 1999)。

最近一些研究明确地将结构变迁包含进解释框架中,以分析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分层结果。“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 社会位置在组成上的变化)在概念上和“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 产权的变化)是不同的。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戈伯(Gerber, 2002)的分析表明,由制度变迁所引致的结构变迁直接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机会,并由此产生了社会分层方面的各种不同结果。在中国农村,魏昂德(Walder, 2002)检验了一种特定的结构变迁——当地雇佣劳动力的扩展——对收入不平等模式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不是农业和私营企业,为工薪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这样,干

部和私营企业主在收入回报方面的变化，将依赖于雇佣劳动和私营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而这一相对重要性并不必然与制度转型有关。

在这些结构变迁下，比如具有较高回报的社会位置（如私营企业主）增多了，人们可以离开他们以前的位置流动到新的位置上，也可以选择不离开。要理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们需要详细地研究人们向特定位置的流动过程。吴晓刚和谢宇(Wu & Xie, 2003: 429)则更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是动态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受市场决定，而是通过积极地寻找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来回应市场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强调了不同的流动过程对收入分配模式变化的影响，并且质疑以前许多学者在后社会主义分层研究中所采用的制度主义的因果解释。然而，不同的流动模式作为吴晓刚和谢宇替代性解释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并没有在他们的分析中得到经验上的证明。

在本文中，我明确地把“制度转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结果”这一过程定义为“制度转型怎样改变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结构，以及个人怎样通过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将着重探讨其中的一个流动过程，即进入到自雇业。这不仅是因为私有部门在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出现是由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直接造成的，还因为与干部和私营企业主相关联的收入优势已经成为后社会主义分层文献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

二、中国城乡进入自雇业的模式：假设

私有部门的发展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私营经济基本上是不存在的。1978年之后，经济改革使自雇业和私有部门开始复苏。与1989年之后的东欧和前苏联所推行的激进的私有化措施不同，中国的改革者采用渐进的方式来扩展私有部门，而不是关闭国有企业或者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Qian, 2000)。政府最初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各种限制。20世纪80年代早期，只有个体户是合法的。按照规定，一个个体户最多只能雇佣8个工人。在很大程度上私营企业主直到80年代中期才得到承认，他们很

多都是从个体户发展而来的。私营经济在 1989—1991 年间经历了短暂的挫折,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得到了新的发展。私营企业完全合法化了,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① 1985 年,私有部门的工业产出不到全国总产出的 2%,但是在 1997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34%。私有部门中的雇佣劳动力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 1981 年的只占全国非农劳动力总数的 2%,上升到了 1997 年的超过 18% (Garnaut et al., 2001; 兰士勇, 2002; 王秀杰, 2002)。事实清楚地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扩展了的市场机会来获得社会经济方面的流动。

尽管私有部门的出现在中国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机会之窗,但它的社会意义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言是不同的。1955 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实行了户口登记制度,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和农村中的机会分布。改革之前,农村居民在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是不可以流动到城市的,他们几乎得不到社会主义国家赋予给城市居民的权利(Wu & Treiman, 2004)。即使是村庄和镇这一级的干部,如果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也不隶属于国家的官僚系统,因此也不会像普通城市工人那样拥有一些特权。^②

改革开始后不久,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基本上被废除了,但是城市的再分配部门仍然继续存在。结果是,农村的自雇活动为那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被剥夺了社会经济机会的人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赚钱成了农村家庭/农村居民(包括干部)减少他们不利社会经济地位的惟一途径。在城市,二元机会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上开始逐渐出现。虽然人们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和政治发展机会仍然主要是在国有部门,但是私有部门为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也提供了另外一条越来越有吸引力的道路。

在这样不同的机会结构下,城市和农村中的自雇业者在个人背景方面是不同的。早期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村的私营企业主主要是生产队干部、留在农村的下乡知青和退伍军人。这些人比普通农民具有更

① 私有部门在 1997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提升到和国有部门一样的地位,这一点在 1999 年被写入了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 2004 年的一次宪法修正案中也被包含了进来(陆学艺主编, 2004)。

② 在改革年代,尽管跨地区的流动和工作的变化相对容易些,但户籍制度和社会的相关限制仍然存在。比如,从农村流动到城市里去的工人仍然被归类为“农民工”,并且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Wang et al., 2002)。

多的人力资本和(或)政治资本(Nee, 1989b)。在城市,大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自于社会边缘群体,比如农民工、失业青年、下岗工人和退休者。对这些人而言,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但通过参与到私营经济中去,他们可以得到更多(Gold, 1991; 李强, 1993)。

因此我认为,进入到自雇业的模式在城市和农村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在干部成为自雇业者方面,我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在城市,干部比非干部更不可能成为自雇业者,而在农村并非如此。

城市干部在国有部门中有另外的机会,而农村干部在 1978 年之后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传统和家庭关系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农村干部倾向于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然而随着农村中进入自雇业门槛的降低,他们对市场上的经营机会并没有完全垄断。

机会结构不仅在城市和农村中有所不同,它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在不断地变化。当私营经济被限制为再分配经济的补充部分时,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的人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边缘群体,即在城市中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们。但是,随着市场取得更多的合法性,而且它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时,作为机会结构变迁的结果,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人进入了市场。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 1992 年取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后,从事自雇活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许多干部放弃了他们在城市再分配部门中的职业机会,“下海”经商了(Wu & Xie, 2003)。考虑到这些变化,我将时间维度引入到进入自雇业的过程中,并检验如下假设:

假设 2: 尽管城市干部比非干部仍然更不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成为自雇业者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这些不同的转型模式怎样解释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收入分配呢? 吴晓刚和谢宇(Wu & Xie, 2003)的研究表明,市场部门的较高收入(包括自雇业者)仅适用于一部分在改革早些阶段进入到市场中的人。而且在这些人当中,那些更可能留在国有部门但是却自愿地放弃他们的利益和优势而进入到市场的人,往往获得更高的收入(Xie & Wu, 2005)。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干部成为自雇业者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早些时候进入者的高收入可能只是反映了由干部摇身一变的私营企业主

(cadre-converted-entrepreneurs)的较高经济收入。为此,我提出了如下关于收入分配的假设:

假设 3: 在改革的晚些时候成为自雇业者的城市干部,往往获得比其他群体更高的收入。

假设 2 和假设 3 只关注城市中的转型动力学及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结果。原因有二:第一,二元机会结构只在城市中存在,这一结构阻碍了劳动者进入到自雇业。第二,城市和农村的改革有着不同的发展途径。在农村,人民公社体系在改革开始后不久即被完全废除;在城市,虽然再分配部门逐渐缩减,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因此,改革阶段对人们进入自雇业的作用,在城市要比在农村更为显著。随着市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化,城市和农村进入自雇业模式可能会趋于一致。因此,在检验这两个假设方面,对农村样本的分析将会与对城市样本的分析进行比较。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文对三个假设的检验是基于 1996 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调查数据。该调查在中国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获得了一个代表全国所有省份(除西藏外)20—69 岁成年人的随机样本,共 6090 人。该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受访者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的信息。其中,农村部分和城市部分的样本是分别得到的,有 3003 个农村个案和 3087 个城市个案。对这两个样本以适当的加权,组成了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人口状况的全国性随机样本。

本文是研究 1978—1996 年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进入自雇业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说,“自雇业”在中国通常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些信息可以从被访问者的职业而获得。然而,参与到经营活动中的劳动者不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职业(Davis, 1999)。而且,上述两类自雇者还没有包括那些从事合作经营但没有正常收入的人。因此,本文将基于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很宽泛地定义“自雇业者”:如果受访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来自于“经营企业或干个体户”、“自由职业”、“在自己家的生意或企业中帮忙”,我们也将将其并入到自雇业者这一群体中

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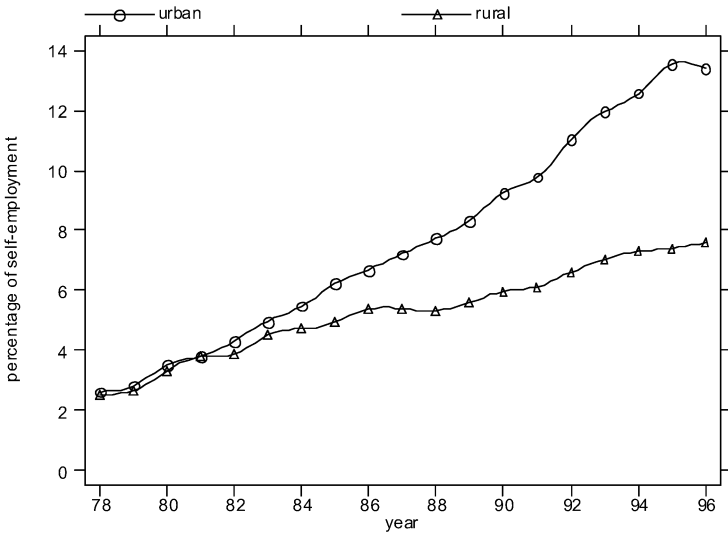


图 1 自雇者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 中国城市和农村(1978—1996)

图 1 描绘了 1976—1996 年间城市和农村劳动力中自雇业者所占的累计百分比。^② 该图所显示的趋势与改革进程是一致的: 经济改革刚开始时, 自雇业者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城市和农村都仅有 2% 的比例);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 自雇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就城市和农村而言, 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差别于 1985 年之前基本不存在, 但是在 80 年代中期之后有了显著地增加。到 1996 年, 自雇业者在城市所占的百分比是 13%, 而在农村只占 7.5%。

表 1 则报告了城市和农村的自雇者及非自雇者在不同方面的特征。在城市, 干部和前干部占全体自雇劳动力的 7.44%, 大大低于他们在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24.6%)。在农村, 干部和前干部占

① 这一群体主要由第一类——“经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组成, 只有很少的个案在第二类和第三类。

② 在这里, 城市和农村基于样本被选择的地点来定义。改革年代, 个人居住的地点很可能与个人所登记的户口所在地不一致。根据 1996 年的调查数据, 城市样本中的 12.4% 拥有农村户口(比如,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里的工人), 农村样本中也有 4.1% 的人拥有城市户口(比如, 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教师)。

全体自雇劳动力的 4.92%，略高于他们在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3.36%)。^①与之类似，党员在城市自雇劳动力中只占 2.3%，但是在城市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20%；在农村，党员在自雇劳动力中占到了 4.57%，而在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 6.10%。在教育分布方面，城市中的自雇劳动力比其他劳动力拥有更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程度；而农村的自雇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则比其他劳动力更高。这些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的自雇劳动力在一些关键特征方面显著不同。

表 1 对所用到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自雇业者和非自雇业者

	城 市		农 村	
	非自雇业者	自雇业者	非自雇业者	自雇业者
在劳动力市场所占的百分比	86.7	13.3	92.5	7.50
干部/前干部	24.6	7.44	3.36	4.92
党员	20.0	2.30	6.10	4.57
受教育年限	8.72 (4.09)	8.00 (3.22)	5.25 (3.85)	7.45 (2.98)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8.6	34.1	66.1	40.2
初中	33.5	46.8	27.0	49.9
高中/技校	26.3	16.4	6.50	9.10
大学及以上	11.6	2.58	.40	.70
农村户口	9.15	31.1	—	—
个案数	2641	415	2772	224

说明：数据被加权，除了受教育年限（括号中的数字是百分比）；对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报告的是均值和标准差（括号里的数字）。

在改革时代，许多农村居民被允许迁移到城市工作，但依然保持他们的农村户口（见前页脚注）。这些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

① 干部身份在城市和农村的样本编码方法略有不同。在城市地区，那些报告他们的职业为“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或者职位级别是“股级”及以上的人被定义为“干部”。农村干部则包括“镇级干部”和“村庄干部”，他们的职位是受访者直接报告的 (Waller, 2002: 238-39)。

到严重歧视(Wang et al., 2002), 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而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在本文用到的调查数据中, 农民工占了城市自雇劳动力的 31.1%, 但是只占在城市挣工资劳动者的 9.15%。

为了检验城市和农村进入自雇业的不同模式, 以及这些模式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风险模型(discrete hazard model)来做统计检验。离散风险模型将分析单位从个人转换为在某一特定时间(年)里的生活事件(进入自雇业)。在本文中, 从 1978 年开始, 或者从受访者 20 岁那一年开始(不管是否在 1978 年之后), 每一年里所有的非自雇劳动力都被认为是处于进入自雇业的“风险集”(risk set)中。那些在 1996 年仍然没有成为自雇劳动力的人则被右删截(right-censored)。

图 2 是基于整理过的数据, 描述了 1978—1996 年每年进入自雇业的发生率。进入自雇业的发生率最初在城乡间没有差别, 但是自 1982 年中国政府的改革重点开始转向城市时开始分化。农村的进入率大致平稳, 但城市的进入率随着改革的推进不断加速。在 1978 年进入自雇业的发生率农村是 0.17%, 城市是 0.33%; 到 1996 年, 农村的进入率 0.50%, 而城市为 1.2% (图中显示的数字已经 LOWESS 平滑曲线方法处理)。

基于整理过的新数据, 我们使用离散风险模型可以通过常规的二分变量 Logit 模型来估计(Allison, 1982)。本文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是否在 1978—1996 年间的某一年从事自雇业。这是一个二分的虚拟变量(是=1)。自变量包括干部身份、党员、教育、性别、年龄、受访者 14 岁时父母中是否有一个为自雇业者、受访者是否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 以及自 1978 年到特定年份的时间(如在某一年份成为自雇者, 则在以后的年份里就不会出现)。干部身份和党员代表了个人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然而, 正如魏昂德、李博柏和特雷曼(Walder et al., 2000)所指出的, 虽然凭借政治文凭(党员)可能获得干部/管理者身份, 但是权力在本质上与后者相关, 而不是与前者(党员)相关。干部的主要技能是管理, 而且他们经常相互交换彼此的社会关系, 所以他们更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私营企业主, 在市场上获得新的优势。普通党员则可能没有这样的优势, 他们不大可能直接把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特权转化为经济回报。因此, 本文关注“干部”这一变量在进入自雇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将党员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这两个变量都被编码为虚拟变量(是=1), 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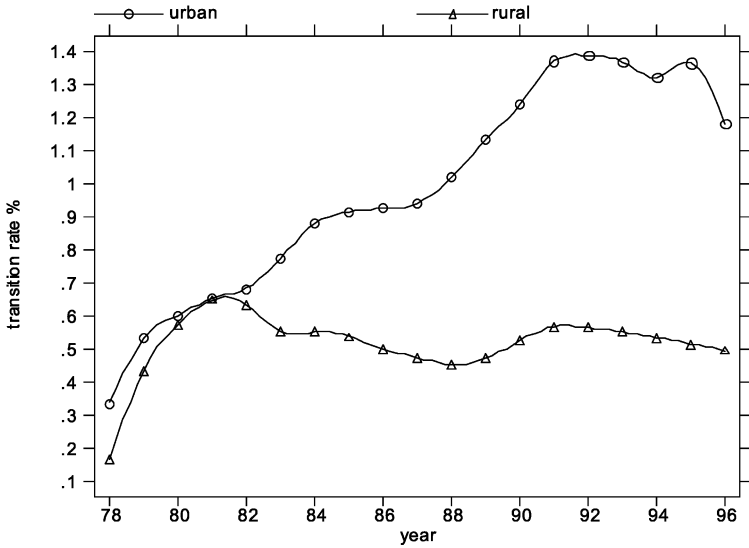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城市和农村进入自雇业的年发生率(1978—1996)

示在风险年之前的个人特征。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量度,是进入自雇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以前有研究报告指出,教育的作用可能不是线性的(如路伯尔等 [Luber et al., 2001] 在西欧国家中观察到的和戈伯[Geber, 2001] 在俄罗斯所观察到的),教育在本文的分析中是一个时变变量 (time-dependent covariate),以风险年前一年所完成的教育程度来测量(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技校,4=大学及以上)。在本文的模型中,教育被当作一系列的虚拟变量。

年龄、性别和父母的自雇身份也是进入自雇业的重要决定因素。年龄是用风险年和出生年之间的差值来测量的。与干部身份、党员和教育这些变量一样,它也是一个时变变量。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1)。父母的自雇身份这一变量作为对家庭背景作用的一个大致测量,它和因变量的测量方式是一样的,即基于所报告的14岁时父母的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总体上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并没有出现重大逆转(见图1),本文在模型中也包括了一个连续变量——风险年与1978年的时间间隔,来测量由于私有部门的发展而导致的机会结构

的变迁。表 2 总结了 1978—1996 年成为自雇业者的一系列特征。

为了考察进入自雇业的模式是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我把 1978—1996 年这段时间分为两个阶段。阶段 I (1978—1986) 是最初阶段。在这一阶段，市场部门只是再分配经济的一个边缘部门，改革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在农村。阶段 II (1987—1996) 是稍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私有部门发展得很快，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大为增加，特别是在 90 年代的城市里。在表 2 中，我报告了将自雇者按照他们开始进入自雇业时所处的改革阶段而进行的交互分类。

表 2 不同改革阶段对自雇业者的个人特征(加权后)的描述性统计:

中国城市和农村(1978—1996)

	城 市			农 村		
	总样本	阶段 I (1978—1986)	阶段 II (1987—1996)	总样本	阶段 I (1978—1986)	阶段 II (1987—1996)
年进入率%	.97	.71	1.26	.54	.54	.54
前干部%	6.88	4.21	8.51	5.18	6.25	4.03
党员%	2.69	3.95	1.91	2.75	1.88	3.6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2.1	37.7	28.7	37.4	41.3	33.2
初中	44.3	37.2	48.7	48.2	46.3	50.3
高中/技校	20.5	22.7	19.1	11.7	10.9	12.4
大学及以上	3.1	2.4	3.5	2.8	1.5	4.0
男性%	54.5	61.3	50.3	70.1	72.5	67.4
年龄	29.2 (11.0)	26.9 (11.0)	30.6 (10.8)	25.0 (9.61)	23.1 (8.15)	27.0 (11.6)
父母为自雇业者	12.8	16.1	10.9	6.96	7.81	6.04
农村移民	31.3	27.1	33.9	—	—	—
改革年限 (1978 起)	10.5 (4.69)	5.32 (2.67)	13.6 (2.24)	9.09 (5.18)	4.68 (2.70)	13.8 (2.09)
事件的个数	438	170	268	243	130	113

说明: 数据被加权; 对连续变量而言, 括号中的是标准差。

从表 2 可以看到, 在改革的整个阶段, 城市中进入自雇业的平均年

风险率从阶段 I 的 0.71% 上升到阶段 II 的 1.26%；而在农村，这样的平均年风险率在两个改革阶段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的干部/前干部在自雇者中所占的比例从阶段 I 的 4.21% 上升到了阶段 II 的 8.51%；而在农村，前干部在自雇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下降，从阶段 I 的 6.25% 下降到了阶段 II 的 4.03%。

下面我通过离散风险模型，首先分析城市和农村在进入自雇业模式方面的不同，以及城市中的干部身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然后，我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进入自雇业的不同模式对后社会主义中国收入不平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所使用的样本是以 100 个城市街道或县为整群抽样的抽样单位，在 Logit 模型和风险模型中都需要对标准误差进行修正 (Walder et al., 2000)。为此，所有的模型都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差 (robust standard errors)，以校正抽样以整群为单位 (城市街道或县) 可能带来的偏差。

四、结果分析

(一) 事件史分析

表 3 分别报告了对城市和农村样本使用离散风险模型估计出来的系数。为了控制改革时间方面的差异，我首先估计了加叠模型 (模型 1a—城市样本，模型 3a—农村样本)，用一个连续变量来代表改革年限。然后用包含了一个干部身份和改革年限的交互项来检验干部是否更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自雇劳动者 (模型 1b—城市样本，模型 3b—农村样本)。由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在城市自雇劳动力中超过了 30% (见表 1 和表 2)，因而也对删除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样本进行了单独估计 (模型 2a 和模型 2b)。

模型 1a 和模型 3a 显示，城市和农村中进入自雇业的模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城市，干部身份显著阻碍了人们进入自雇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干部进入自雇业的风险率只是非干部的 47.7% ($= e^{-0.741}$, $p < .001$)。在农村，干部比非干部更可能成为自雇者，但是这在风险率上的差别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也许是由于样本太小的原因)。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1，即认为干部比非干部在城市更不可能成为自雇者，但在农村确并非如此。

表 3 对进入自雇职业的离散风险模型估计：中国城市和农村(1978-1996)

	城 市				农 村	
	包括农村移民		不包括农村移民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干部	-.741*** (.228)	-1.705* (.571)	-.629** (.243)	-1.764* (.636)	.636 (.537)	1.526* (0.702)
党员	-1.514*** (.294)	-1.502*** (.295)	-1.472*** (.333)	-1.457*** (7.042)	-.832 (.540)	-.881 (.536)
教育：小学及以下(参照类)						
初中	-.418*** (.122)	-.414*** (.122)	-.563*** (.164)	-.557*** (.164)	.828*** (.160)	.821*** (.161)
高中/技校	-.786*** (.167)	-.785*** (.167)	-.954*** (.201)	-.953*** (.201)	.759* (.331)	.760* (.329)
大学及以上	-1.374*** (.297)	-1.383*** (.296)	-1.385*** (.308)	-1.397*** (.308)	2.075*** (.472)	2.127*** (.452)
年 t 时的年龄	-.060*** (.005)	-.061*** (.005)	-.062*** (.006)	-.062*** (.006)	-.072*** (.012)	-.072*** (.012)

续表 3

	城 市				农 村	
	包括农村移民		不包括农村移民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男性	.508*** (.106)	.507*** (.106)	.492*** (.135)	.491*** (.135)	.766*** (.182)	.764*** (.181)
父母为自雇者	1.024*** (.204)	1.029*** (.203)	1.229*** (.241)	1.236*** (.239)	1.290*** (.298)	1.310*** (.294)
改革年限	.097*** (.016)	.092*** (.016)	.086*** (.018)	.077*** (.019)	.037* (.014)	.043** (.014)
交互项						
干部 * 改革年限	—	.087* (.042)	—	.104* (.047)	—	.120 (.065)
常数项	-3.275*** (0.218)	-3.218*** (.212)	-3.224*** (.354)	-3.135*** (.337)	-4.346*** (.357)	-4.400*** (.362)
Pseudo R ²	.093	.094	.085	.086	.092	.093
Log-likelihood	-2177	-2175	-1545	-1543	-1407	-1405
事件的个数		438		279		243
风险集中的人 - 年数		43824		38645		46139

说明:括号中是根据主要抽样单位(街道/县)调整之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数据被加权。

* p < .05, ** p < .01, *** p < .001 (双尾检验)。

党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城市中的党员比非党员更显著地不可能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他们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只是非党员的22% ($=e^{-1.514}$, $p < .001$)。但是在农村, 党员和非党员在进入自雇业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教育对成为自雇者的作用,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然而, 它所起作用的方向却是不同的。在城市,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不可能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与小学教育及以下的人相比, 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及以上的人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分别是65.8% ($=e^{-0.418}$)、45.6% ($=e^{-0.786}$)、25.3% ($=e^{-1.374}$)。与此不同, 在农村,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成为自雇者: 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及以上的人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分别是只受过小学教育及以下人的2.3倍 ($=e^{0.828}$)、2.1倍 ($=e^{0.759}$)和8倍 ($=e^{2.075}$)。

其余变量的作用也并不令人惊奇。首先, 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年龄与进入自雇业的可能性都是反向相关的。年龄每增加一年, 在城市将减少5.8% ($=e^{-0.060} - 1$)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 在农村这一数字是6.9% ($=e^{-0.072} - 1$, $p < .001$)。这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人对再分配部门所需要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更多的投资, 因此职业变迁对他们而言风险更大 (Gerber, 2001; Róna-Tas, 1994)。其次, 就像在其他国家 (如 Gerber, 2001) 和中国其他背景下 (Davis, 1999; Entwisle et al., 1995) 所发现的那样,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成为自雇者。控制其他因素 ($p < .001$), 男性成为自雇者的风险率在城市是女性的1.7倍 ($=e^{0.508}$), 在农村则是2.2倍 ($=e^{0.766}$)。最后, 家庭背景在城市和农村都显著地影响成为自雇者的可能。对那些父母至少有一个是自雇者的人 (当他们14岁时) 来说, 在城市中他们成为自雇者的风险率是父母都不是自雇者的2.8倍 ($=e^{1.024}$), 在农村中则是3.6倍 ($=e^{1.290}$)。这一结果验证了以前的发现, 即企业家精神可以在代际间传承 (如 Szelényi, 1988)。

如上文所提及的, 我在事件史模型中包含了改革年限这一连续变量, 用以检验进入自雇业的时间趋势。^① 模型1a和模型3a显示, 进入自雇业的风险率随着改革的进行有所上升。在城市, 1978年之后进入自雇业的净风险率以每年10.2% ($=e^{0.091} - 1$)的比例上升 ($p < .001$)。农村这一上升速度则小了很多: 进入自雇业的净风险率每年只上升

^① 年龄的平方项也被加入模型中以检验二次项的作用, 但是该项的系数并不显著。

3.8% ($=e^{0.087}-1$, $p<.05$)。这些结果与图 1 所显示的模式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干部这一变量对成为自雇者的作用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估计了含有干部身份和改革年限交互项的模型(模型 1b—城市样本,模型 3b—农村样本)。模型 1b 中的交互项有一个显著的系数($p<.05$),这表明,城市中的干部比非干部仍然更不可能成为自雇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可能这样做。1978 年后,干部进入自雇业的净风险率以每年 9.1% ($=e^{0.087}-1$) 的速度上升。1978 年时,干部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只是非干部的 18.2% ($=e^{-1.705}$),但是在 1996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87% ($=e^{-1.705+(96-78)*0.087}$)。这一结果说明,尽管城市干部有双重的机会可供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可能参与到自雇业中去。假设 2 由此得到了支持。

农村转型的情况正好相反。模型 3b 显示,农村干部在 1978 年(改革年限=0)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是非干部的 4.6 倍 ($=e^{1.526}$, $p<.05$),但是从 1978 年开始,他们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迅速地以每年 11.3% 的比例下降,其下降速度仅差一点就通过统计显著性的检验了 ($p<.10$)。这一结果与在城市中发现的模式有极大的不同。它表明,没有另外的替代性机会的农村干部,是最早抓住新出现的市场机会的群体之一。由于大部分有企业经营能力的干部可能在改革早期就已经在农村中成为私营企业主,他们不再处于风险之中。然而,进入自雇业的风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长这一事实表明,有其他社会群体在改革的晚些时候不断参与到自雇业中去。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干部和非干部在进入自雇业方面没有总体上的显著差别。

总结上面的事件史分析,本文发现,进入自雇业的动态模式在城市和农村中是不同的,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随着改革的推进,不论在城市和农村人们都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者。尽管干部身份、是否是党员和受教育程度都显著地阻碍了人们在城市中成为自雇者,但它们在农村对成为自雇者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或者没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而且,虽然城市干部最初比非干部更不可能进入自雇业,但随着改革的进行,他们越来越可能这样做。另一方面,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干部则在改革一开始就已经抓住了成为自雇者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和农村转型动态模式的不同,很可能因改革时期的人口迁移浪潮而有所偏误,特别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迁移。如表 1 所报告的那样,城市中超过 30% 的人并没有当地的城市户口。与

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Aldrich & Waldinger, 1990), 那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机会, 因此更可能从事自雇活动。为了表明城市进入自雇业的模式并没有被这些流动人口所主导, 我使用剔除掉那些非户籍人口的样本重复了上述分析。模型 2a 和模型 2b 的结果表明, 剔除掉非户籍人口的影响的转型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前面的结果相一致。

上述来自中国的发现, 回应了西方众多研究自雇业的社会学文献(Aldrich & Waldinger, 1990; Arum & Muller, 2004)。一些学者强调自雇业形成的社会边缘性(social marginality), 他们的研究表明, 自雇者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 这些群体被排除在已有的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之外。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了具有经济资本和智力资源的特权群体的优势(见 Martineili [1994]的文献回顾)。通向自雇业的不同道路, 对收入不平等和阶级结构也有不同的启示意义。比如学者们争论, 最近自雇者群体的发展将导致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Steinmetz & Wright, 1989), 或者将导致劳动力的边缘化和无产阶级化(Arum & Muller, 2004)。为了探索上述这些不同的转型过程的启示意义, 我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做了一个补充分析。

(二)对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析

在中国, 有证据表明, 进入自雇业是向上社会经济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自雇者在收入所得方面是赢家。1996年中国城市自雇家庭的人均收入为 10975 元, 比那些没有进入自雇职业的家庭高出 60%。在农村, 自雇家庭的人均收入为 6666 元, 是那些没有参与到自雇活动家的人均收入的 2.4 倍。^①

为了表明上述不同的转型模式是如何解释 1996 年的收入分配的, 我估计了以人均收入的对数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根据吴晓刚和谢宇(Wu & Xie, 2003)的研究, 我将自雇群体细分成两部分: 早些时候进入者(1986 年及之前)和晚些时候进入者(1986 年之后)。

表 4 报告了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模型 4a 中, 自变量包括 1986 年人均收入的对数、教育、党员、干部身份、年龄和进入者类型。这些变

^① 家庭人均收入是根据所报告的家庭年收入除以家庭有工作成员的人数得来的。

表 4 对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的多元线性回归(OLS 估计):
中国城市和农村(1996)

变 量	城 市		农 村	
	Model 4a	Model 4b	Model 5a	Model 5b
1986 年家庭人均收入(ln)	. 268*** (. 051)	. 268*** (. 051)	. 434*** (. 033)	. 434*** (. 033)
教育: 小学及以下[参照类]				
初中	. 294*** (. 049)	. 291*** (. 048)	. 156* (. 059)	. 156* (. 059)
高中/技校	. 331*** (. 052)	. 332*** (. 052)	. 409*** (. 066)	. 408*** (. 067)
大学及以上	. 482*** (. 053)	. 477*** (. 053)	. 172*** (. 155)	. 173*** (. 152)
党员(是=1)	. 121** (. 039)	. 128* (. 039)	. 105 (. 080)	. 106 (. 078)
干部(是=1)	. 069** (. 032)	. 049 (. 031)	. 207 (. 110)	. 206 (. 108)
男性	-. 070* (. 032)	-. 072* (. 028)	-. 109** (. 034)	-. 110** (. 034)
年龄 * 10	. 062* (. 024)	. 061* (. 024)	-. 026 (. 018)	-. 026 (. 019)
进入者类型(非自雇佣者[参照类])				
早些进入的人(1978-1986)	. 024 (. 209)	. 018 (. 205)	. 511*** (. 107)	. 516*** (. 105)
晚些进入的人(1987-1996)	. 157* (. 062)	. 120 (. 067)	. 530*** (. 081)	. 523*** (. 080)
交互项				
早些进入的人 * 干部	—	. 076 (. 360)	—	-. 071 (. 467)
晚些进入的人 * 干部	—	. 602* (. 255)	—	. 459 (. 307)
常数项	6. 147*** (. 338)	6. 163*** (. 334)	4. 949*** (. 265)	4. 948*** (. 265)
R ²	. 170	. 174	. 302	. 302
N	2247	2247	2586	2586

说明: 数据限于那些在 1986 年及之前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

括号中的数字是根据主要抽样单位(街道/县)调整之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数据被加权。

* $p < . 05$, ** $p < . 01$, *** $p < . 001$ (双尾检验)。

量的编码方法和前面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① 由于我们在方程中控制了1986年人均收入的对数，自变量对1996年人均收入的对数的净作用可以理解为对收入变化的净作用。与边燕杰和罗根(Bian & Logon, 1996)以及周雪光(Zhou, 2000)所报告的结果类似，教育、党员和干部身份都对收入增长有正向作用($p < .001$)。年龄的作用也是显著正向的($p < .001$)。在1986—1996年间，男性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女性。^②

模型4a中最有趣的发现是，只有那些在1986年之后进入自雇业的人，才比那些仍留在原有位置挣工资的人具有收入上的优势，这一优势为17.0% ($= e^{0.157} - 1$)。这一结果验证了吴晓刚和谢宇(Wu & Xie, 2003)的观点，即认为具有更多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是自我选择进入到市场部门的，而这些人收入方面往往高于其他人(另可参见Szelényi & Kostello, 1996; Xie & Wu, 2005)。

前面的分析表明，城市干部更可能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成为自雇者，这改变了城市自雇劳动力的组成成分。为了检视城市自雇劳动力在这方面的变化(即有更多的干部企业家)是否能够解释晚些时候进入者的收入优势，我在模型4b中包含了干部身份和进入者类型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晚些时候进入者的收入优势，完全来自于那些在1987—1996年间开始从事自雇活动的干部企业家们(cadre entrepreneurs)所具有的优势。1996年干部企业家的收入是普通自雇者收入的2.06倍 ($= e^{0.602+0.120}$)，而且这一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 < .05$)。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

上面的这些结果在农村这一不同背景下也显示出不同。模型5a和5b显示，无论自雇者何时进入自雇业，他们在1996年比非自雇者显示出更高的收入优势，这一优势为68% ($p < .001$)。干部身份和进入者类型的交互项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由干部转成私营企业家并不比其他背景转成私营企业家更具优势。

城市和农村的这些不同，为我们理解制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如何塑造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这些不同的模式表明，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连接制度转型和收入不平等

① 省份作为一系列虚拟变量也被包含在了模型当中，它们显著影响收入。但是加入省份变量之后，所估计出的个人特征的系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样的。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报告没有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② 换句话说，这10年中人均收入的性别差距缩小了。这一发现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的劳动力的不同流动过程,我们就不能直接从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模式来推断制度变迁的影响。

五、总结和讨论

20多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贫苦农民没有想到,当他们在—纸文书上按下指印,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包产到户”之时,他们的英雄举动竟然写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变革的第一篇章——农村改革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研究制度转型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我们应当将利益(interest)与行动者(agency)置于这一过程的核心位置,因为,正如迪玛佐(DiMaggio, 1988)所指出的:“没有利益群体的介入,制度永远不可能发展和运作”,而制度的继续和变迁取决于那些行动(act)和不行动(not act)的人竞争的结果。

社会学家对制度主义/结构主义的一般批评同样适用于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即他们往往把个人行动者(human agency)看作是—完全被动地受制度和结构的影响与制约,而忽视了制度/结构从何而来的问题。正如布劳(Blau, 1977: 5)所说的:“社会流动的过程是大部分不同形式的结构变迁里的本质要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机会—流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劳动者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以及在不同的改革阶段进入自雇业的模式,并将这些模式与中国收入分配模式的变化联系起来。本文特别关注干部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为此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并通过数据分析支持了这三个假设。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入自雇佣业的模式在城市和农村几乎完全不同:教育因素在城市中阻碍了劳动者进入自雇佣业,而在农村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党员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都显著地减少了劳动者进入自雇业的可能性,但是在农村都对劳动者进入自雇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1)。

很明显,中国的转型轨迹为城市的干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成为自雇者的机会。在城市,干部尽管仍然比非干部更不可能进入自雇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可能这么做(假设2)。在农村,干部是最早抓住企业经营机会的群体之一。之后,他们看起来没有了优势。

这些在中国不同背景下进入自雇业模式的差异,很好地表明了市场转型的社会结果和社会过程是多么复杂。事实上,市场转型争论的

各方都能从复杂的图景中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比如,上述在农村地区的转型画面与市场转型论相一致:人力资本(教育)增加了人们进入自雇业的机会,而政治特征则对获得有利的市场机会没有显著的作用(Nee, 1989a)。然而,当我们跳出农村这一背景,却发现城市中并不是这样。尽管城市干部仍然比非干部更不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但他们在改革的晚些阶段越来越可能这样做。这与罗纳塔斯(Róna-Tas, 1994)所发现的且仍在进行的“权力转型”过程相一致。

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并非来自于从不同途径得到的经验结果,而是来自于学者们为了理解这些经验结果而采用的理论框架。如果从中国农村得到关于“干部与群众在成为私营企业家方面没有显著差别”(Nee, 1989a)的结果反映了市场化的作用,那么在城市中“干部比群众更不可能成为私营企业家”这一发现,就会在同样一个解释框架下成为问题,因为再分配权力理应在城市更为盛行。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干部企业家的收入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来自于他们过去所拥有的权力,而可能只是反映了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作用(Gerber, 1999; Xie & Wu, 2005)。

因此,我强调机会结构的变迁和个人的选择性流动,是宏观制度转型和社会分层结果变化之间的一个中间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假设说,制度本身对分层结果具有内在的作用。市场转型的结果将依赖于扩大了的市场部门怎样改变不同社会行动者所面对的机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如何回应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本文的分析表明,那些能够在变化了的结构里将自己更好定位的人将胜出。他们将重新确定自己的优势,并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秩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自雇业者在本文中被定义得很宽泛,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的背景下,它可能包括非常具有异质性的活动。因此,进一步的分析需要有更为细致的分类,来讨论向自雇业流动的社会经济涵义(见Wu, 2006)。第二,由于数据的关系,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转型方面的一些重大变化并没有在本文的分析中反映出来。比如,农村集体部门的干部/管理者现在可以合法地将自己转换为私营企业主(Li & Rozelle, 2003),城市中的干部现在也可能以非法的手段侵吞国有财产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企业(Walder, 2003)。另外,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也导致了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率的上升,从而迫使一些工人从事小规模自雇活动以谋生计。在那些情况下,自雇业

可能只是“一个穷人的避难所”，而不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Hanley, 2000）；机会结构和流动机制也可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所以，以后的研究需要将正在变化的机会结构和一些具体的变量联系起来，以进一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机会—流动”命题。

参考文献：

- 边燕杰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兰士勇，2002，《1989—1999年的中国个体经济》，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蓝皮书（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强，1993，《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陆学艺主编，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秀杰，2002，《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与展望》，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蓝皮书（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llison, Paul 1982 “Discrete-Time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Event Historie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ed.) by S. Leinhardt.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Aldrich Howard & Roger Waklinger 1990.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 Arum, Richard & Walter Muller (eds.) 2004 *The Reemergence of Self-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ian, Yanjie & John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Blaug, Peter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Bonnell, Victoria E. & Thomas Gold (eds.) 2002 *The New Entrepreneurs of Europe and Asia: Pattern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 Cao, Yang & Victor Nee 2000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 Davis, Deborah 1999, “Self-employment in Shanghai: A Research Note.” *China Quarterly* 157.
- DiMaggio, Paul J.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ed.) by Lynne G. Zucker.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 Co.
- Entwistle, Barbara, Gail E. Henderson, Susan Short & Zhai Fengying 1995, “Gender and Family Businesse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Yang Yao & Xiaoli Wang 2001, *Private Enterprise in China*. Canberra, Australia: Asia Pacific Press.

- Gerber, Theodore 1999, “Membership Benefits or Selection Effects? Why Former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Do Better in Post-Soviet Russi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9.
- 2001, “Paths to Success: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Entry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1(2).
- 2002, “Structural Change and Post-Socialist Stratification: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 Gold, Thomas 1991, “Urban Private Business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eds.) by Deborah Davis & Ezra Vogel.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Hanley, Eric 2000,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A Refuge from Poverty or Road to Rich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3.
- Li, Hongbin & Scott Rozelle 2003 “Privatizing Rural China: Insider Privatization, Innovative Contrac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China Quarterly* 174.
- Luber, Silvia Henning Lohmann, Walter Muller & Paolo Barbieri 2001, “Male Self-Employment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elevance of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s across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0(3).
- Martinelli, Alberto 1994,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s.) by Neil J.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e, Victor 1989a,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1989b,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China.”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ed.) by Victor Nee & David Stark.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Parish, William L. & Ethan Michelson 1996,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Qian Yingyi 2000, “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1978 — 1998): The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6 (1).
- Róna-Tas Áko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 Sørensen Aage B. 1996,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Steinmetz, George & Erik Olin Wright 1989,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Changing Pattern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Szeftely,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zeĽnyĽ, Ivan & Eric Kostelb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Treiman, Donald J. & Andrew G. Walder 1996, *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istributed by the UCLA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scnet.ucla.edu/issr/da>
- Walder Andrew G.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s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Walder, Andrew G., Bobai Li &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 Wang, Feng Xuejin Zuo & Danqing Ruan 2002,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Living under the Shadows of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
- World Bank 2000,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Wu, Xiaogang 2002,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s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80.
- 2006 "Family Businesses in China (1978—1996); Entr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of China's Domestic Private Firm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s.) by Anne S. Tsui & Yanjie Bian. New York; M.E. Sharpe.
- Wu, Xiaogang & Yu Xie 2003, "Does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Wu, Xiaogang & Donald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49—1996." *Demography* 41(2).
- Xie, Yu & Emily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 Xie, Yu & Xiaogang Wu 2005, "Market Premium, Social Process, and Statistic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 Zhou,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作者单位:香港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张志敏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an work as pure indicators of marketization.

Jumping into the Sea: Self-employment in labor markets transi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1978—1996 *Wu Xiaogang* 120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portunity-mobility perspective to illustrate how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respond to changes of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in the labor markets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and how labor mobility affects social stratification. Using the data from a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the patterns of the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nd across different reform stages are examined. Analysis shows that education and cadre status both significantly deterred people from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urban areas but not in rural areas. However, urban cadres are more and more likely to become self-employed over time; and the income advantages of the more recently self-employed in urban areas are entirely due to the higher income returns to the cadre-entrepreneurs.

The Experiences of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Peasant Egalitarianism Mentality: A story of house building competition *Lu Huilin* 147

Abstract Based o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ouse building competition in a village during the post-collective era, this paper detects a kind of egalitarianism mentality concealed in that phenomenon. The author makes use of field data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o construct a story line to interpret the making of peasant egalitarianism. Although the genesis of peasant egalitarianism can be foun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entality mainly took shape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ization.

COMMENTARY AND DEBATE

Exogamy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Societies *Zhang Yan* 165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classificatory system once prevalent in Australian aboriginal tribal societies. 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mistakes and topics ignored by previous scholars, and then gives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Through relatively concise definition and delineation of the process, the author tries to avoid possible mistakes i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orough research on Australian exogam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ason for classificatory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conclusion section.